

《典籍里的中国》： 古籍大众传播的成功范例

□张志清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推广中，古籍的大众传播是个难点。古籍用繁体字、文言文、竖排版，没有标点断句，导致一般人看不懂，敬而远之。古籍装帧朴素平实，不像其他文物形式多样、艺术特点突出，吸人眼球。虽然古籍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思想文化，但绝大多数古籍目前只适合小众传播、分众传播，大众传播的成功范例不多，而这也使得古籍成为文化遗产中“活起来”的难点。

今年大年初一晚上黄金时段，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之《尚书》专题节目，借助舞台话剧和古今对话，诠释古老典籍《尚书》的内涵。节目一经播出，就以深厚的历史积淀、创新的艺术手法、炉火纯青的表演功力、古今穿越的震撼效果，击中亿万电视观众的心灵，瞬间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央视综合频道副总监许文广用“舆论炸裂”来形容民众对该片的反响。据央视最近统计，该节目网络视频播放量超1.4亿人次，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超7亿，成为现象级传播产品。网友和媒体纷纷盛赞该节目“传播文化自信”“震撼人心”。

《典籍里的中国·尚书》播出后，很多不了解《尚书》的观众都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读一下这部先秦传下来的、文字古奥的典籍。国际《尚

书》学会会长钱宗武先生说，《尚书》与其他经典《周易》《诗经》《春秋》还不一样，后三者大家耳熟能详，传播较广，但《尚书》比较“高冷”，学者和读者关注较少。通过《典籍里的中国》，激发了民众对《尚书》这部中华民族元典的关心和对其传承的历史和现状的关注，使整理研究者感到惊喜。可以说，《尚书》是从最小众传播变成了最大众传播，最难“活起来”的古籍《尚书》今天却率先“活起来”了，这无疑是古籍传播的一次巨大成功。电视观众评论中最亮眼的一句话是：“就这样干。”

《典籍里的中国》何以取得如此震撼的传播效果？我把主要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

把古老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和现代意义的思想提炼彰显出来

《尚书》是中华民族元典，蕴含着丰厚深邃的思想文化、远古传说和历史故事。如何在九十分钟的节目里把《尚书》精髓提炼出来，引起观众共鸣，难度非常大。据节目组介绍，为拍好《尚书》这个专题节目，前期做了大量资料搜集工作，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和国家图书馆帮助下找到500多个《尚书》中的形象和故事，反复研究筛选，最终把伏生这个人物和《禹贡》《牧誓》两段故事提炼出来，让

大众能看懂、能品味，发挥了优秀节目直奔主题、震撼观众的效果。

这部九十分钟的专题节目回答了：什么是“典籍”？中华民族的元典是什么？《尚书》是谁传下来的？为什么要传《尚书》？中华民族从哪里来？未来要走向何方？中华民族精神是什么？问题很有冲击力。

《尚书》专题节目设置了“专家破题点评”和“典读会”两个环节，看似头绪有点多，但实际上是通过带着大家读书来点题、破题，把《禹贡》《牧誓》的几句最要紧的话反复点出，做到最大限度的主题提炼。

《禹贡》叙事，重点在大禹治水和划分九州上面，塑造了大禹这个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形象，讲述中华民族在困难面前胸怀天下、不屈不挠的奋斗故事。《牧誓》塑造出周武王这个铲除暴虐、吊民伐罪的英雄形象，揭示了人心向背对战争成败的重要性。两个故事合在一起，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凸显出来，也把伏生舍命护书、传承《尚书》、延续文脉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不断打动着观众，让观众收获满满，也使节目具有灵魂和血肉。

实现了舞台艺术与电视艺术的创新结合

《尚书》各篇时代跨度超过两千年，讲好《尚书》故事，不可能不在时空上有跳跃、有变化，但又不能没有主线，不能没有相对固定的表现方式。节目制作采用了创新性艺术手法：通过一个固定的戏剧舞台，一条书籍传承的主线，一个伏生舍命护书的形象，实现了上下四千的时代穿越。伏生之上的两千年，讲述《禹贡》《牧誓》两段故事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思想精髓；伏生之下的两千年，讲述书籍传承的艰辛和未来的文化自信。伏生之外，现代读书人撒贝宁也穿越到伏生时代，去体味《尚书》的内涵和传承的意义。伏生和撒贝宁的互动，诠释了对作为民族“根”与“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延续，艺术表现稳而不乱，专而不杂，效果突出。

倪大红扮演的伏生，是节目的艺术灵魂。他用炉火纯青的演技，把伏生保护传承《尚书》的感人故事展现在大家面前，直击人的心灵和泪点，让古籍保护传承有了让世人了解、理解、参与、奋斗的宣传效果。节目中有一幕是百岁伏生穿越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到去图书馆参观的孩子们都能背出《禹贡》原文，在露出欣慰笑容的同时，也现出经历大苦痛的悲凉，让我们不禁想起保护传承古代典籍《尚书》的艰辛。所以，《典籍里的中国》同样也能打动图书馆员、古籍保护修复者、古籍收藏整理研究者的心。这些长期在自身岗位上守护、传承经典的人们，就是现代“伏生”。他们默默无闻的工作和多年如一日的坚守，通过伏生这个形象诠释了自身价值，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和尊重。听到伏生的扮演者倪大红一句“我岂能不舍命护书啊”，很多人都是热泪盈眶。倪大红说，他演伏生这个角色，“是用心血来演，要演得干干净净”。正是这种对中华文化典籍保护传承精神的不懈追求，才使舞台上的伏生与现实生活中的众多“伏生”心灵相通。

（下转第10版）



《典籍里的中国》： 古籍大众传播的成功范例

(上接第9版)

□张志清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与 学术基础上制作节目

《尚书》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与国家治乱命运一致，本身就是典籍传承、流散、保护、复原的典型事例，也是历代学者渴求寻回民族之根与魂、渴求典籍复原、坚持辨伪存真科学精神的一部波澜壮阔的文化史、学术史，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学术基础。

《尚书》在历史上屡遭水火兵燹。秦火之后，靠伏生献书（今文《尚书》）和鲁壁发掘（古文《尚书》），以及诸儒解说传到后世。今、古文《尚书》在两汉聚讼纷纭，结果都在汉末魏晋战乱中散佚消亡。东晋出现伪孔传古文《尚书》，平白多出 25 篇，却受到朝野推崇，经过后世学者音义注疏，被当作官方定本传

古文《尚书》散佚无闻。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进献伪孔传古文《尚书》，把孔安国序打散分在各篇之首，把过去古文《尚书》拆分为 33 篇，又收集先秦《尚书》佚文，加上自己的文句，伪造了 25 篇，合为 58 篇。由于真伪并存，又钻了学术争端的空子，很快就被朝野推崇，从南北朝末年到隋唐，传到全国，成为《尚书》通行本。唐代开成年间在长安刻立石经，传到现在。目前世界范围内尚存世的敦煌遗书《尚书》写本有 49 件之多，都是伪孔传古文《尚书》。其中馆藏一件唐写本《尚书》残卷，进馆时十分残破，被修复师们比喻为“一团乱麻”。但在文献专家和修复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将乱麻复原成卷。这卷《尚书》用工楷写就，正文用大字，内容为《尚

书》卷第一《尧典》后半与《舜典》全部。注释双行小字，即“孔氏传”。敦煌遗书保存的《尚书》反映了唐代在敦煌设立学校、修习儒家经典的情况，用的本子都与长安一致，这是儒家文化在丝绸之路传播的例证，也说明当时伪孔传古文《尚书》作为唐朝推行的《尚书》正本传播之广。

南宋初年，学者吴棫在《书稗传》中已经怀疑伪孔传古文《尚书》前出 33 篇。元刻明修本《附释音尚书注疏》二十卷，在孔颖达《尚书正义》基础上增补了《经典释文》中关于《尚书》的音义。《经典释文》是南北朝末到唐初著名学者陆德明的著作，影响很大。当时郑玄注《尚书》在世，但陆德明却选择了伪孔传古文《尚书》作为底本，抬高了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地位。不过，陆德明还是在《尚书》前出的 33 篇音义中保留了汉代郑玄、马融、王肃等人的古注，使我们对这三家注的原文还能有所了解，十分难得。

南宋初年，学者吴棫在《书稗传》中已经怀疑伪孔传古文《尚书》前出 33 篇

国，以及欧美等国。海内外研究注释《尚书》的名家和成果很多。最新《尚书》解读当属国际《尚书》学会会长钱宗武先生解读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导读、原典、注释、点评等部分，很方便读者阅读，其中导读勾勒了《尚书》全貌和流传史，集中了当前《尚书》研究的最新成果。

《典籍里的中国·尚书》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和国家图书馆的大力支持。正是有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和坚实的学术基础，才能挖掘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不断修正知识和学术偏差，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

《典籍里的中国·尚书》在古籍大众传播上取得了成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也还留有一些遗憾，如没能在节目中应用考古发现的新成果清华简《保训》。《保训》作为周文王给周武王的遗嘱，与节目中的《牧誓》有着天然的联系，伏生穿越到现代图书馆时如果看到他护《书》之外的《保训》尚在人世，会激起多少感慨！也会对未来传承更有信心。《典籍里的中国·尚书》也没有把镜头拉到场外，去看一下真正的现代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如果让伏生从熹平石经到敦煌遗书、宋元善本、明清辨伪的珍善本中走过，会激发观众更多的热情。

了解古籍中蕴含的 文化思想是广大民众的迫切需要

《典籍里的中国·尚书》所产生的强烈社会影响，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是民众对中华文明探源和挖掘典籍里的文化更多期待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需要。加强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研究、利用任重而道远，需要全体古籍工作者加倍努力，也需要媒体和大众的互动参与。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先生曾把全国古籍工作比作一条大河：上游是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保护和揭示；中游是高校科研院所的古籍整理和研究；下游是古籍出版和数字化。这条大河还要汇入大海，就是全体华夏子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传承、阐释推广、弘扬创新，也要通过艺术创新和媒体传播，让古籍中的有益成分，加速形成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激荡人心，影响未来。

在这方面，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肩负历史重任。国家图书馆典藏三百多万件珍贵古籍，正在全国古籍收藏单位全力推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图已深度参与《典籍里的中国》，提供专家咨询和文献资源，与央视、国家话剧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等单位共同把这个节目打造成新时代的文化精品。《典籍里的中国》一旦走进国图，让观众见识国宝，看到当代“伏生”——图书馆员们对典籍的守护工作，相信会把文化自信更多地传达给观众。《典籍里的中国》的强力推出也让我们相信，我们的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利用并不是孤军奋战，有党中央的规划部署，有民众的全力参与和热情支持，当代“伏生”事业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明·杜堇《伏生授经图》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下来。从伏生传书至此大约经历了千年。南宋吴棫、朱熹开始怀疑此书作伪，到朱熹弟子蔡沈做《书集传》，开创辨伪工作的先河，一直到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才把另 25 篇伪作定为实论。辨伪工作又经历约千年，可见典籍传承之难。在汉代就被立于学官、由国家推动传承的《尚书》都是如此命运，典籍在民间的传承可想而知。目前，国务院颁布的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收录《尚书》各种最有传承意义的传本注疏共计 26 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历代《尚书》版本和研究著述中也不乏反映《尚书》传承史的重要文献。兹举几例：

馆藏最早的《尚书》遗存是东汉熹平四年（175）至光和六年（183）刻的石经残石。东汉时期，今、古文《尚书》聚讼纷纭，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也分为欧阳和大、小夏侯三派。学者莫衷一是。熹平年间，学者蔡邕进言把标准文本刻在石碑上，刻了《尚书》《周易》等 7 部儒家经典共计 64 石，正反面用隶书书写，立于东汉洛阳太学讲堂前。其中《尚书》以今文欧阳《尚书》为主，校以大、小夏侯本。熹平石经刻立后，士大夫和儒生前来传抄，车马塞途，盛况空前。但熹平石经刻立不到十年，就发生董卓之乱，石经未能幸免，毁于战乱。宋代以来，偶有熹平石经残石出土。国图收藏的残石存 13 字，内容是《尚书·尧典》的一部分。

经历东汉末年和三国两晋战乱，今、

书》卷第一《尧典》后半与《舜典》全部。注释双行小字，即“孔氏传”。敦煌遗书保存的《尚书》反映了唐代在敦煌设立学校、修习儒家经典的情况，用的本子都与长安一致，这是儒家文化在丝绸之路传播的例证，也说明当时伪孔传古文《尚书》作为唐朝推行的《尚书》正本传播之广。

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尚书正义》二十卷是唐代孔颖达等人奉唐太宗之命厘定的《五经正义》之一，自然受到研究者高度重视。此书首次将前代单传的经、注、疏合为一体，方便人读。《尚书正义》初称《尚书义疏》，以伪孔传古文《尚书》为底本，重点采用隋人刘炫、刘焯的旧疏，“二刘”都是不遗余力推广伪孔传古文《尚书》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尚书义疏》问世后受到批评，不断修改，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正式公布，定名为《尚书正义》。从此，《尚书》的新定经典和正规解说只有《尚书正义》。科举考试“明经科”必遵照《尚书正义》。宋代国子监沿用唐代传统教授《尚书正义》，借助两浙东路茶盐司用雕版印刷扩大推广，更加确定了其权威价值。但八行本后世在中国失传，在日本流传的两部，其中之一在清末时由杨守敬自日本购回，现藏国图；另一部藏在日本足利学校。日本弘化四年（1847），熊本藩时习馆以此为底本影刻。2018 年，日本前首相、熊本藩主后人、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向国图

与后出 25 篇文体上有显著差别。大儒朱熹很赞成吴说，感到传世伪孔传古文《尚书》不少篇目可疑。他的门生蔡沈受师命作《书集传》，注释简明精要，点明哪些是后出经文，很有警示意义。国图收藏的宋淳祐十年（1250）上饶郡学吕遇龙刻本《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六卷《书传问答》一卷，就是此书最早的印本。蔡沈《书集传》在后世影响很大，元仁宗时立于学官，明清两朝科举考试都以此书为标准注本。

吴棫之后的辨伪工作历时千年，元时吴澄作《书纂言》，把孔传序置于全书之后，以明其疑。明代梅赜在《尚书谱》和《尚书考异》中，辑录古籍资料来证明伪古文和孔传是伪品。到清阎若璩时，彻底揭开了伪孔传古文《尚书》的真面目。在阎若璩撰写的《尚书古文疏证》九卷中，列举作伪证据 128 条，证明孔传古文《尚书》后出 25 篇及孔传都是伪书。至此，伪孔传古文《尚书》后出 25 篇是伪作在学术史上成为定论，《尚书古文疏证》也成为著名的翻案之作。

在辨伪的声浪中，清代学者孙之騄、孔广森、卢见曾、陈寿祺等都试图复原伏生解读《尚书》的原貌，从古籍中挖掘、辑佚了不少佚文，裒辑成书。如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抄录《尚书大传》，传为伏生解说，其弟子张生、欧阳生记录师说，对《尚书》作了很有意义的整理和挖掘。

《尚书》历史上也传播到日本、韩

袁东珏：修复路上没有“退休”一说

□本报记者 刘晓立

皮肤白皙，话音带笑，一头利索的卷发打理得整整齐齐，说起古籍修复来眼里仿佛有光，她就是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导师助理袁东珏。

袁东珏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迈进古籍修复的门槛，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即使在退休后，也欣然接受返聘，坚守在岗位上修书、授徒。如今已年逾古稀的她，业余时间尤其喜欢健身，“我坚持每天锻炼身体，想要活得更长久，因为我想在这个岗位上坚持更久”。对于她来说，修复路上没有“退休”一说。

在西湖边开启修复之路

1965年，18岁的袁东珏刚参加工作时的在四川新华印刷厂从事平装书和精装书的装订，那时的她有一个大学梦，渴望文化知识，但由于各种原因，先是考到了印刷技术学校，后又从学校被下放到印刷厂，“大学梦”无奈破碎，可能够时时与书接触，又让她感觉有一丝欣喜，也为之后从事古籍修复打下了一定基础。

“我是1980年被调到四川省图书馆的，一开始是从事精装书与平装书的修复。”袁东珏回忆说，“工作之余常常听馆里一位老师傅讲有关古籍和古籍修复的故事，很快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非常想接触这门事业。”

机遇来了。1983年，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分别在上海和杭州两地开展古籍修复训练班，历时一年，由上海图书馆修复师赵嘉福、潘美娣及浙江图书馆修复师钱蟾影等分别担任两地任课教师，学员由全国各省选派人员参加，而袁东珏就是当时的四川省代表。“去之前我对古籍并没有多少概念，但牢牢记住了我们馆特藏部主任沙铭璞先生的嘱托，”沙铭璞先生交给她一个用纸包着的包袱，里面是已经成为书砖的一部古籍，并嘱咐她说“你要去好好学习，学好以后，将我们图书馆的书清理修补出来，这样不但能增益全国，可能还会增益世界”。就这样，可以说对古籍还一无所知的袁东珏踏上了前往浙江图书馆学艺的旅途，也从此踏进了古籍修复的大门。

浙江图书馆位于西湖边，但袁东珏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欣赏美景。为了学到全套古籍修复技艺，她白天上课，下了课追在老师身后提问，晚上还要回到教室修复这块“书砖”。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将这部古书抢救出来，并重新装订。回成都的路上，途经上海图书馆，在版本学专家的帮助下，她查到自己苦心修复的这部书原来是乾隆年间的《中江县志》。

看着这册经自己之手从“书砖”变成修复齐整的《中江县志》，袁东珏产生了浓浓的自豪感与成就感，感受到中华传统书籍装帧形式的神奇与书籍保管传承的不易。原本就对平装书、精装书装订有一定了解的袁东珏很快喜欢上了古籍修复，立志要把此项技术学好、学牢，给古籍创造更好的保管、保护条件。

把握每部书的修复需求

培训结束后，四川省图书馆也重新恢复了古籍修复工作，至今已抢救性修复了大量古籍，其中有很大比例就出自袁东珏之手，包括四川省图书馆镇馆之宝《洪武南藏》、宋代雕版印刷的《茶经》、清康熙年间瓷板刻本《周易说略》等珍本、孤本。在日复一日、问题多样的修复工作中，袁东珏逐渐有了心得，她说：“古籍修复，就得一边做，一边想，最难的

不是技巧，而是制定修复方案。”

“有一次泸州市图书馆送来一册虫蛀、老化非常严重，且经前人不当修复的书，让我犯了难。”这册书是乾隆刻《大竹县志》，乃泸州市图书馆镇馆之宝，也是全国孤本。“拿到手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书叶老化脱落，后被人用A4纸和化学胶水粘了上去，这是违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不仅不利于古籍保护，而且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因此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这些白纸和化学胶水去掉。”袁东珏介绍说，如果是修复常用的糨糊，可以用水将它慢慢软化，不会对古籍书叶造成影响，但胶水是无法用水解决的，而且原书叶纸张本来就老化了，白纸和化学胶水遇水取不掉，原件也会受到损伤。那怎么办？“我想起馆里有个老师到日本学习了缩微复制，在日常工作中应该也遇到过原件被黏贴胶水的情况，于是去请教了他，使用了他从日本带回来的脱胶水，等到书叶慢慢软化并全部浸湿以后，将上面的一层白纸轻轻剥掉，再将虫蛀、老化的书叶进行修复。”袁东珏表示，这类问题在修复中常常遇到，是比较难解决的，所以要格外强调修复过程的可逆性。

还有一个在修复中常遇到的问题是：作为修复人员，在保护古籍原样与更好地提供利用方面该如何平衡？“有一回，馆里拿给我两部嘉庆《新都县志》要修复，一部八册，一部只有两册。制定修复方案之前，我对那两部书进行了初步了解，发现八册的那一部内容基本是齐全的，只是第一本缺少书名页、附页及序；而另一部虽只剩两册，却恰好包含八册本缺失的那几页内容。”经馆里版本专家鉴定，这两部《新都县志》同属清嘉庆时期刻本，版本信息安全相符，当为同一版本。于是，袁东珏开始思考：对残存古籍修复时是否可以补齐其文献信息，能不能补齐？这是业界一直在探讨的课题，根据整旧如旧原则，应尽量只对其破损进行修复，不去干扰其文献信息，而且真要补齐，也需要懂得一些版本学、目录学和文献学的知识，对书籍有足够了解。“但经专家鉴定，两部为同一版本，我想若能用残损的两册本补齐八册本缺失的部分，凑齐整整齐齐的一套《新都县志》，为读者提供利用，应是极有好处的。”考虑到这部书为普通古籍，查阅的读者比较多，利用率较高，袁东珏“补齐完本”的修复想法得到了馆里领导的一致认可。

要不要对原有文献信息进行补齐，是因修复理念和具体案例情况进行决定的。“以前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傅们还手把手教我们练习补栏，但现在不要求，也不提倡了。”袁东珏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仅在于保存书籍，还在于读者服务，只要对两者有益就是应该做的。

装帧是袁东珏最熟悉，也最感兴趣的修复环节，可以说她在装帧形式上下了很大功夫。“有一本《新修罗氏家谱》破损情况有些奇怪，虫蛀、老化不严重，反而是人为撕裂比较多，这引起了我的好奇。”经过仔细查看，袁东珏发现被撕裂的部位集中于一些记载图表、图像等信息的书叶。“原来这部家谱用的是线装形式，图表、图像等信息一页放不下，读者阅读时，为了看全信息，就容易把书叶扯开。”注意到这个原因，袁东珏开始思考：怎么把撕裂的地方修好，又使读者能够方便阅览。最后她想到了蝴蝶装的形式。“蝴蝶装是版心朝里相对折，打开后整张书叶能够看全。但该书原来是线装，根据整旧如旧原则，还希望能保留之前装帧的形式，

于是我试着改成了线装蝴蝶装，即书籍整体看上去还是线装形式，但打开书叶，它是以蝴蝶装的形式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能够看到整张书叶。”袁东珏形象地说，做修复就像给书看病，需要“望闻问切”，要能够走进书里面，经常要和书对话，真正把握每部书的修复需求。



袁东珏（右）指导年轻人修复实践



《大竹县志》修复后

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

自1984年学成归来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四川省图书馆的修复室里只有袁东珏一人。但凭借着对古籍修复的热爱，她从不觉得枯燥或孤单，相反非常投入，一方面不断磨练技艺，注重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另一方面享受在修复中的乐趣。

“四川省图书馆始建于1912年，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自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展古籍修复工作，但是到我学习时已经没有人专职从事古籍修复了。回来以后，怀着对古籍修复的兴趣和信心，我跟领导申请了一间房子，趁热打铁，一个人一点点摸索着置办工具，开展修复，这一坚持就是几十年。”因为喜欢，在外人看来枯燥的、简单的修修补补工作，袁东珏却总能从中发现乐趣；因为热爱，袁东珏主动在业余时间提升自己，考取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对目录、版本、古代汉语、中国史书等有了一定了解。

“古籍修复有很多手法，包括补、裱、衬、镶、装等，每一道工序都不一样，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多年实践研究才能做好。而当你费尽心血将一些濒临绝境的古籍抢救修复出来以后，那种感觉能让人瞬间忘掉所有的辛苦和烦恼，所以一点儿不觉得枯燥和孤单。”袁东珏有个小习惯，喜欢听收音机，伴随着自己喜欢的歌声，沉浸在一个人修复古籍的环境中，让她非常满足。

“自己一个人坚持了20多年，到2002年增加了一位新同事开始学习修复，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后，陆续陆续又来了很多年轻人来学习和从事古籍修复，队伍一下子就壮大了起来，到现在，我们已经组成了11人的修复团队。”这些年古籍修复行业发生的变化，让袁东珏感觉非常受鼓舞，经过宣传，大家都对古籍修复有了更多的认知和了解，

有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补充到修复队伍中，也有不少企业关注到古籍修复领域，为修复工作提供所需，为古籍修复的发展与创新奠定了基础。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推动下，近年来，四川省古籍修复与保护取得了重要成果，逐步完善古籍修复工作各项制度，于2010年挂牌成立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并购进大量纸张、设备，使修复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尤其是2016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成立以来，实现了图书馆、博物馆、高校的跨系统联动，以古字画装裱修复专家、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徐建华为指导，袁东珏、欧萍、许卫红为代表的修复师们丰富的师承渊源和多门类的技术背景，为四川修复中心传习所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接力传承，责任重大

年轻人才的加入为古籍修复这项传统的技艺输入了“新鲜血液”，让新技术的融入与跨领域的结合成为可能。在对年轻人的培养中，袁东珏一边强调爱心、耐心、恒心，一边鼓励他们提高综合素质，她对古籍修复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觉得古籍修复要代代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人员的培训、修复技艺的提升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有热爱和坚守这份事业的责任心。”袁东珏认为，古籍修复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经验，往往“欲速则不达”。“年轻人要多花时间学习，不管是理论知识，还是学科知识都要学习，要耐得住寂寞，热爱古籍，敬畏古籍，这样才有动力。”

除了人员成长需要时间外，有很多古籍破损的“疑难杂症”也需要时间去攻克。“比如纸张酸化、老化、起黄褐斑，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而且随着环境因素或者时间的推移还会加剧，那怎么延缓它的老化，就需要年轻人进行探索，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在这方面的任务更重。”袁东珏希望年轻人不但是要学基础知识，还要进一步从科学的层面来研究如何保护好古籍，如何让古籍免遭损害或者延缓损坏速度，让古籍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南京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建设及思考

□韩 超 南京图书馆



我国的古籍数字化自上世纪 80 年代机读目录始，至今已有 40 年左右的发展历程。目前，各大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主要是古籍原本的数字影像化，近年来又在工具数据库、知识发现系统等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古籍再生性保护与研究利用来看，古籍的数字影像化、数字化影像集成数据库建设以及数字影像的远程访问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心任务。

南京图书馆较为系统地开展古籍扫描约在 2007 年左右，并且从 2011 年开始向公众开放扫描件的在馆阅览服务。截至目前，南京图书馆已完成约 8000 部古籍的扫描工作，总计形成了约 500 万拍的数字化影像文件。应该说，南京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影像的总量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在数字化工作中，南图实行“一个原则，两条路径”的工作方式。一个原则就是以保护古籍为原则，图书馆的数字化工作不仅是

为了阅览服务，更重要的是为了古籍保护。如果因扫描而使古籍受损严重，那么这样的扫描工作是不值得开展的。两条路径：一是在日常工作中长期有计划地进行古籍数字化工作，其原则就是以古籍等级为标准，依次进行扫描；二是以阅览服务和古籍整理项目带动数字化扫描。原则上（即没有研究古籍物质性的需求），南图藏明代以上善本古籍一般是不出库的，需要扫描后在馆阅览电子件。但是，读者需要阅览的古籍与已扫描的古籍必然不可能完全重合。因此，当读者所需善本尚未扫描时，读者可以通过电话预约扫描，南图会提前安排阅览古籍的扫描。如此则解决了扫描进度与读者阅览需求的矛盾问题。

2017 年起，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又成立了“数字资源开发组”，对扫描文件进行深加工——文献的一、二级类目标引工作。这一规划是为今后更好地在全网发布古籍影像埋下的伏笔。众所周知，古籍目录没有现代目录的页码索引功能，见篇目而不知在哪一页是常有的事。若直接上手翻阅，在篇目明确的情况下倒也能较为快速地找到相应内容，但转换成电子件后便无法实现。标引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件中建立篇目与相应图像位置的联系，读者仅欲查阅某几个篇目就无需逐页翻检。为此，南图古籍部数字资源开发组制定了详细的《古籍数字化元数据著录规则》，其宗旨就是建立古籍文本与电子文件间的“图—目”联系，《规则》总纲云：“古籍的数字化文本在排版上和原书一样，结构一般有以下几个层次：封面、封二、题名叶、序跋、目录、正文、封底，读者可以依据图书的叶码顺序翻叶阅读，也可以点击标引链接到所需阅读叶面。”目前，南图主要完成一、二级类目的标引，个别古籍还会深入到三级标引。这一工作很快就在南图全新的阅览系统中得到了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实用价值。

为了提升馆内数字化影像阅览服务，南图于 2019 年底开始建设新的电子阅览

系统，并在 2020 年开馆后投入更多的电子阅读设备以适应日益增长的数字影像阅览需求。新的电子阅读设备整合了古籍查询和阅览的双重功能，检索、阅读更为方便，系统的功能也较原来单纯图片式阅读更为丰富，而标引工作在新系统中也正式发挥了它的作用。新系统的主体界面就是阅览区与标引区的组合界面。读者可以在阅览区逐页浏览古籍，同时也可以通过标引区直接链接到自己需要的某小类，提升了阅读体验。更为重要的是，阅读系统和标引实现了结合，为进一步在全网发布古籍积累了经验。

2017 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联合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过万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和好评。可见，古籍数字化影像的远程访问是大势所趋，也是国家古籍保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牵头下，南图于 2018 年发布了首个远程访问的自建古籍全文影像资源库——《稀见方志全文影像数据库》。2019 年、2020 年两年，南图又陆续发布了《南京图书馆藏清人文集全文影像数据库》，共计发布文集 200 部，其版本及作者的年代跨度贯穿清朝历代。“十四五”期间，南图仍将以增加古籍数字化影像的数量为核心，不断提升古籍阅览服务水平。另一重心就是打造全新的古籍影像数据库发布平台，其古籍收入数量及操作模式将会有一个新的跨越。

纵观南图及全国古籍数字化建设情况，应该说我国的古籍数字化建设在近几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基本满足了一般研究的需求，也为大众认识古籍开辟了一个新的窗口。但仍有一些问题可供商榷，笔者在此略闻鄙见，以就教方家。

首先，数据库建设仍以量为优先。公共图书馆的最大优势是收藏量丰富，研究者对图书馆资源的期待也多在此。平台

打造得再好，没有一定数量的古籍资源支撑，也不过是徒有其表，难以真正满足研究者对资源的渴求。专业数据库、知识发现系统的建设也都是建立在丰富的资源之上的，我们不能离开资源的量而侈谈资源的质。

其次，数字化影像的精度有待提高。出于版权及存储设备负荷的考虑，能够远程访问的数字化影像精度一般较低。虽然基本能够满足研究者对文献内容的需求，但很难满足版本形式研究的需要。特别是有些数据库仍以灰度图，甚至是黑白影像为主，其在除正文文字以外的内容利用方面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再次，发布版本的选择需有新的思考。目前，善本占古籍数字化发布比重较高，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数字化影像建设之初最为亟需的。但是，随着善本发布达到一定数量后，对于发布版本的选择则需要重新进行思考。比如某些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的古籍，是否有必要大量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发布。又如某些乾隆六十年以后产生的精校精刻之本，虽然从国家定级的角度来说不能寓于善本之列，但其重要性则不亚于某些善本，是否应该加大这类书的发布，等等。

第四，丛书的书目标引需进一步加强。古籍被数字影像化之后就丧失了部分物质形态，因此原附着其上的某些实用信息被抹杀，这要以新的方式使研究者利用到。以丛书为例，一部百种以上的丛书，研究者需利用的可能仅是其中的某一种。未被数字化之前，某些丛书会利用签条、书根题名等方式方便检索，但数字化之后这些信息就没有了。如果在发布数字影像时能一一标明某册为某书某卷，笔者认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较为便利的。

这些仅是就古籍数字化影像本身所作的一些思考，至于服务器的承受力、阅读的流畅程度、阅读模式的兼容及标准统一、检索字段的丰富化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则有待技术工作者与文史工作者共同努力。



浙图实习记：体验古籍馆员的日常

□储晨凤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20 年 8 月，为期五周的浙图实习告一段落，回顾这一个多月的实习生活，我们通过实践学到了很多，有了很多第一次的经历：第一次尝试大面积“补虫洞”，第一次染纸，第一次编目。虽然因为网课的限制，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知识都非常欠缺，但在老师们的细心、耐心指导下，我们也从开始的手足无措到慢慢掌握了节奏。

修复得先“去火气”，再多练习

正式实践的第一天，浙江图书馆资深修复师汪帆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古籍部的一些基本情况，当时老师说到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新纸入库后，要放置很长一段时间才可以使用，是要‘去去火气’。”让新纸老化一段时间，可以和古籍更加匹配，时间价值的加持，也让纸张变得更加珍贵。纸张经过实践的沉淀，才能成为合适的补纸，而我们作为学生也是一样，只有经过不断地尝试、练习、实践，才能以一个更加自信、优秀的姿态参与到修复工作中去。我深刻地体会到：修复工作永远不能急于求成，只有沉得住气，才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为了裁好纸，我们练习了一整天的时间，虽然练习量还是不够，但是相比之前的生疏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姿势改进了很多。虽然裁纸只是最最基础和“简单”的工作，但是要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势必要经过枯燥的练习和艰辛的努力。我们常常感叹老师的操作行云流水、云淡风轻，汪老师后来却说，这样的水平其实“不值一提”，不过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间断地修复实践后达到的，抱着一生做好一件事的信念，只有在一个事情上付出足够多的时间，才有可能在某一领域达到顶尖。一万小时的理论或许就是这样。

裁纸、折页、齐书口、压平、装线钉、裁切、订线、贴签条，从纸张变成一本线装书需要经历许多道工序，从每道工序来看，似乎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一过程却是一环扣一环，丝丝入扣，不能马虎。哪怕在一道工序上做出了微小的妥协，到最后都会发现“寸步难行”。每一处的细节都决定着最终的成品，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在完成一本线装书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折页不够好、纸张变形、书口扭曲便齐不好书口；装上的纸钉松一分，书芯就会挪动；接头的处理会影

响书籍的平整度；裁切的齐整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一本书的美观程度，做不好，书只会越变越小；订线的笔直与否也关乎线装书的“门面”；到最后贴签、帘纹、宽度、长度、材料都要考虑到。

体验编目与数字化的“不容易”

接下来的两周多我们来到浙图本馆，学习全新的内容。在杜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第一次系统上的编目操作，尽管在课堂上也曾有过几次练习，但是在实习中操作却有所不同。比如说此次实践中编目的影印线装书隶属于《金华珍稀古籍选刊》，需要在 2252、461 字段进行填写，尽管学习过相关内容，但是在过往的练习中并没有尝试编写过，并且这次还碰到了书中出现舆图的古籍，需要在 205 字段 \$c 子字段进行填写说明。

在浙图卢老师和秦老师的介绍下，我们参观了数字化的一些步骤和过程，从选目、填单、调书、交接、拍摄、编卷目表、审核到最终完成一本书的数字化，都需要数字化制作单位与图书馆之间进行合作。尽管现在数字化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也有一些图书馆仍然选择缩微的方式

进行古籍再生性保护，缩微胶卷相比于数字化的硬盘储存来说，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作为数字化的一个补充也有着存在的价值。在卢老师的演示下，我们一行三人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缩微胶卷的使用。随着科技的发展，对文献的保护方式在不断更迭，但并不意味着就要用新技术完全取代旧技术。

在浙图本馆实习工作的内容，更多的是使用图创系统对“四库系列丛书”进行注册和加工。图书馆的工作不乏一些重复性的劳动，但是，正是这些重复性的工作，才能够让读者通过检索书名、作者或者其他信息，在书海中找到自己所需要资料的位置，也能够让图书馆对馆藏的资产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虽然通过这短短二十几天的实习，我们的水平很难得到很大提升，但在初级阶段，我们或许更应该学会的技能是懂得欣赏“好”东西，知道什么是“美”，试着去品味细节，“心之所向，身之所往”。另外通过这几周的学习，我们对图书馆的日常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对未来的就业有了更清晰的认知，这也是实习带给我们的收获之一。